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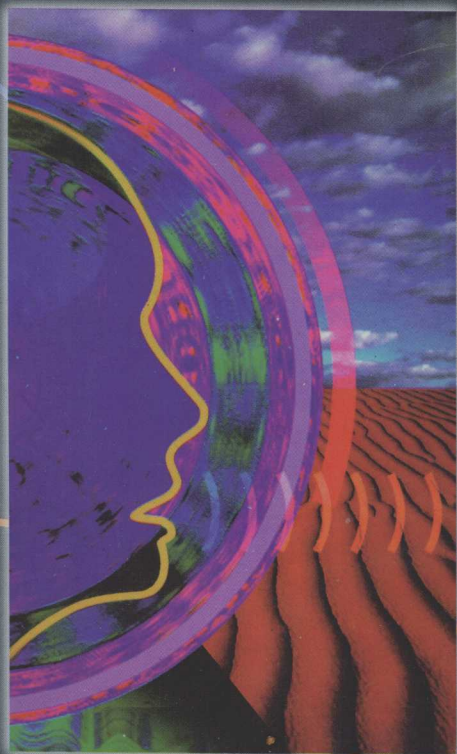
未来的文化空间

WEILAI DE WENHUA KONGJIAN

孙绍振 南 帆 王炳根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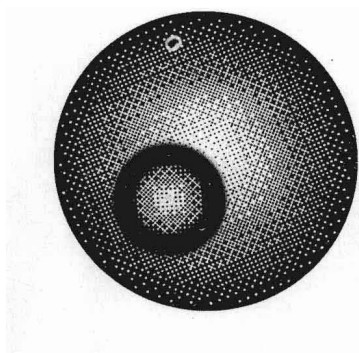


未来的文化空间

WEILAI DE WENHUA KONGJIAN

孙绍振 南 帆 王炳根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福州

未来的文化空间

WEILAI DE WENHUA KONGJIAN

孙绍振 南 帆 王炳根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11 印张 259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1—02871—8

I·41 定价:15.4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孙绍振 南 帆 王炳根

福建的文学理论曾经在 80 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最兴旺的时候，以诗歌理论、方法论以及小说理论称雄一方，曾经发动过、参与过当代文坛上几次意义重大的论战。至今仍然给我们愉快回忆的是，当时我们曾经与北京、上海的文论家们并列，号称“闽派”。不过，在中国文论的历史翻过 80 年代这一章之后，再回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由于福建人特别浓重的乡土观念导致了多多少少的夸张，因为其中还包括了虽为闽籍、但已不在福建工作的谢冕和刘再复等。当中国文论进入 90 年代以后，一个理论背景上更加多元，更加缤纷的历史阶段开始了。福建文论界的变化给人的感觉，令人想到了鲍照的诗：“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们已经不再那么执意地纠缠在客体的反映与主体性哲学思辨上了。年轻的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有了日新月异的更新。多元西方文论的引进，使得不同的理论家已经不可能统一在一元的话语之中。因而就出现了当前的话语纷繁的，既不能说是噪杂，又不能说是交响的局面。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文论正如我们的世纪一样正在经历着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关键。虽然，就现状来说，严肃文学和严肃文论一起正经受着商业大潮的严峻挑战，文论处于空前寂寞的境地。但是对于献身文论的我们来说，也许，这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从积极一方面来说，至少可以使我们减少几分浮躁，增添一点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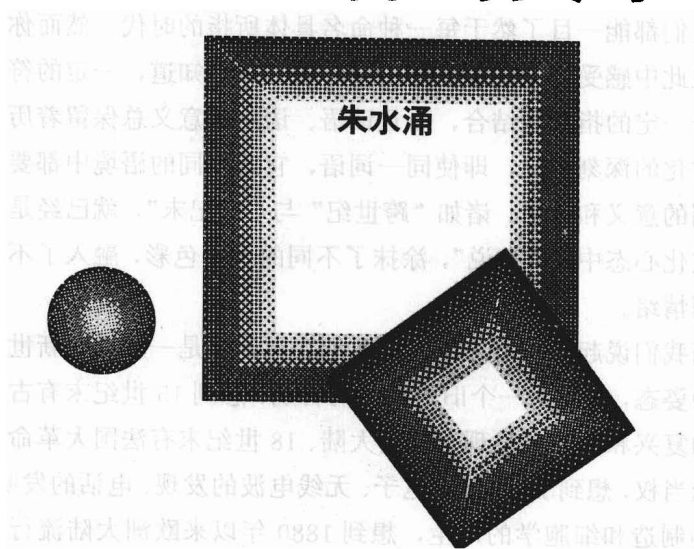
耐住寂寞，就是守住思想的自由，何况，对于富有历史感的、有远见的理论家来说，再也没有比在历史转折点上探索更为引人入胜的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在这种关节点上，常常有些在当时看来默默无闻的议论，在后来却成了至少是有文献价值的东西。正是考虑到这些，同时，也是为了在今日，检阅我们的力量和新成就，我们组织、编辑了这本学术专集。作者都是当前福建文艺理论与评论第一线的人物，所涉及的内容已多多少少超越了传统文学理论的范围：除了小说诗歌和文学理论以外，这里还有电影、文学、幽默和视觉图画的研究。在这世纪之交，我们想把这本不算丰厚的礼物献给当代文论的爱好者，特别是关注我们福建文论界的同行们。但愿我们的劳作能够给他们一点鼓舞，使得他们和我们一样满怀着创造的信念，提前跨入 21 世纪，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1997 年 1 月 18 日

目 录

1	序
1	现状与未来：世纪交替的文学
29	从神话到现实：女性主义文化描述
65	电影艺术：崛起与衰落之间
101	传媒革命：艺术符号的冲突
139	工业时代的文体：小说导论
159	城市的故事：侦探小说思考
191	古典与现代：回归中国诗学的冲击
239	现代文化生态：幽默理论的建构
277	理论视域的拓展：超越认识论模式
311	语言的魔力：坚守文学的维度

现状与未来： 世纪交替的文学



“跨世纪”与“世纪末”

关于 90 年代的文学，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命名，如跨世纪文学、世纪末文学、世纪之交的文学，也有人称逼近新世纪的文学。从客观的时空指涉上看，这众多的说法并不会会有太严格的区别，人们都能一目了然于每一种命名具体所指的时代。然而你又分明在此中感受到不同命名的不同心态。我们知道，一定的符号总是与一定的指意相结合，而且话语、语词的意义总保留着历史的、文化的深刻记忆，即使同一词语，它在不同的语境中都要产生不同的意义和指向。诸如“跨世纪”与“世纪末”，就已经是一定的文化心态中的“言说”，涂抹了不同的人文色彩，融入了不同的心理情绪。

当我们说起“跨世纪”时，我们会想到这是一种迎向新世纪曙光的姿态，想到对一个旧的世纪的告别；想到 15 世纪末有古典艺术的复兴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8 世纪末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当权，想到 19 世纪末电子、无线电波的发现、电话的发明、汽车的制造和细胞学的产生，想到 1880 年以来欧洲大陆流行的“新艺术”、“新故事”、“新女性”、“新时代”等等用“新”字辅助的名词，还要想到目前正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跨世纪工程”、“跨世纪人才”和“跨世纪目标”等等。这样一种“跨世纪”的姿态，意味着一种更新的意识波及整个社会形态，意味着一种积极重新安排自己生活的进程，表征着一种理想浪漫的昂扬的憧憬未来的精神状态。

奇怪的是，尽管“世纪末”的科学界定也包涵着“新世纪的曙光”，但人们说起“世纪末”，就会在心理上产生某种怅惘的末世之感，怀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恐惧。

上个世纪末的序幕可以说是由普法战争拉开的，而后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性的暴力征战和扩张掠夺，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铁蹄对于东方帝国的践踏，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幽灵，看到了伦敦开始成为“雾都”，看到了波德莱尔、马拉美、陀斯妥耶夫斯基等艺术家对世界前途的怀疑、悲观、失望和孤独、苦闷、绝望的心理及其迅速蔓延，听到1893年德国著名作家马克斯·诺尔丹发出的感慨：“好一个世纪末国王！好一个世纪末狱卒！好一个世纪末少女！”在诺尔丹看来，世纪末是世纪最终的意思，有“世纪末日”的含义。

或许正是这种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使得那些关注着社会前进、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人们，更喜欢用“跨世纪”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姿态；而那些关注着人的生命存在、忧虑着人类生存的人们，更愿意用“世纪末”来表达对这个时代的体验。

而许多历史学家则向世人指出，世纪末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到这种时候，一是追挽旧世，一是怀想新的时代的来临，每个民族那种以求更生的反省本能在世纪末会尤其的活跃。而且在一个世纪之末，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会发生较重要的社会变革，社会、文化结构和思想意识会呈现多元状态，文艺、民风会发生较大的演变。

总之，在世纪之交这个历史交替时刻，新的一个世纪的到来会激发人的探索与追求的热望，变革和希望由此孕育而生；而一个世纪的终结也会给人们带来难以掩饰的悲哀，由此世纪之交也会成为颓废精神的最好寄生地。这正如古茨塔夫·勒纳·豪克所说：在世纪末，“焦虑和希望被推向极端。一方面是焦虑转化为绝

望；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异于‘纯粹的’希望还转化为信心。”

本世纪末的 90 年代，中国与整个世界一样，发生了让人预计不到的巨变。在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墙倒了、超级大国没了之际，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了坚持 40 年之久的计划经济，而推行了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个转向是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化、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情势下进行的。因此，一面是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一面是文化转型的措手不及。中国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相对一致的政治立场与文化价值取向在这时消逝了，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这次的分化是与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很不一样的。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的分裂，是文化启蒙的一致目标下因为政治立场的不一而发生的“退伍”、“颓唐”、“高升”与进取，分化后的队伍成员依然处在文化中心的位置上行使着各自不同政治方向的文化权力。而 90 年代市场经济成为中心，文化随之边缘化的倾向带来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危机，是近一百年来人文知识分子中心位置的失落。发生在 90 年代的关于“激进主义”与“退守主义”的思考，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两王”之争等等文化热点，表明在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对自我角色的反省和重新确认。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现代化而执著的“心想”和思想呼叫，到 90 年代可以说进入了另一个段落，“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母题已经不再为人们所关注。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才真正地介入了 20 世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

这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之一，是商品经济与现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谋合。

90 年代，那种“技术和大众传媒成了认识论发生作用的真正载体”的可怕现象正在日趋明晰，中国人从未有过地在一天 24 小

时之内受到如此众多的物质性形象的轰炸。现代广告借助于现代传媒，以生命形象的诱惑，正在形成对人的现代需求实行一种心理上的垄断；工艺与技术相结合的电子音乐，电视唱片正在暗暗地将人的心灵歌唱转变成一种技术的物质性的处理；卡拉OK通过其高度的简化和公式化的流行曲调和歌词，让人在官能最基本的刺激中，消磨了个性而满足于自娱自乐；而电脑的迅速普及，在把我们与世纪联系起来的的同时，又把我们纳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系统之中。在这样一个现代传媒狂轰滥炸的时候，每一个“此时”都有着繁缛错落事物的共同存在，90年代的空间，每一个瞬间都在强加给人们极为复杂的世纪景象。

就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的一批文化经纪人、电视剧制作人、影、视、歌各种明星和书商、小报记者、剪报撰稿人应运而生。正如有的批评家指出的，他们“分享了一大批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他们成了新文化的弄潮儿”，他们摒弃制造深度的文化产品，而满足于批量复制平面的形象文化，来占据普通大众的阅读时空，从而使自己在流通领域中占有显赫的位置。文化权力的这种存在方式在90年代的中国从未有过地得以扩展，并且沾沾窃喜地庆贺着自身介入流通的胜利。

这样，对百年文化历史的不同回眸，对当下状态各式各样的态度和介入，从旧有历史的重新思索到新生现实的多种探寻，引发出了世纪交替时期中国千姿百态的文化景观，出现了一种看似丧失主体实则是重新确认主体、重新寻找生存原则的精神现象，呈现了世纪末多元价值选择的状态和可能。

因此我们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既可感受到独立思考 and 质疑的良知，又可听到顺乎当下状态的满意歌唱；既能体味到世纪临界点上的焦虑，又可看到躲避焦虑的轻狂。重建与消解、反抗与沉沦、紧张与无奈、个人化的独语与大众式的叙事，构成了文

学外在各行其是而内在则尖锐冲撞的多元共存局面。

多元并存与矛盾对峙

尽管 90 年代的中国文学已退居边缘，已失却了主流，已无法再达成人们美好愿望中的审美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成了一片“废墟”，就沉沦到处处是“灵魂缺席”。事实上，90 年代中国文学的动荡是中国新经济情势逼使下文化重组的一种体现，而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恰恰是在世纪交替时期发生时，其精神现象便有了双重的紧张和繁复。因而，90 年代的文学面貌尤其的纷纭，特别难以拢在一起，它与现实、与生存有了更复杂多样的关系，也由此让我们从中察觉、感受和看到更多层面的时代信息。

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是因为文学给了人们这个时代最初始最直观的人文景观。

90 年代初，出现于 80 年代后期的“新写实”，依然保持着占有大量读者的势头，那时大型文学刊物《钟山》还推出“新写实大联展”，力图让文学延续 80 年代的社会效应。“新写实”文本实际是对新的现实状态无从把握的一种逃避，那种琐细人生的叙事、流水帐式的日常流程、零度情感的切入视角，都表明了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生存面前的无奈。回到现实回到尘世的创作意向，对“现实的就是合理”命题的认同，使得这批小说放弃了日常生活的诗意想像，这是作家自动放弃了诗性超越和价值评判的表现，也吻合了 90 年代初期人们对价值寻求的厌倦心态。但在这批小说中，对于“小人物”平庸人生的关注，却也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于形而下日常生存的低调素朴的人文情怀，这是 90 年代中国文学转变趋势的初期预示。

企图再度让文学纠集在一面旗帜下，让文学重新占据人们视

野的努力，是对所谓“新状态小说”的命名，这次命名是伴随着一些中年作家创作基调的变化和一批晚生代作家创作的特殊面貌而由一些文学评论家鼓捣起来的。进入90年代之后，王蒙有了“季节”系列小说，刘心武有《风过耳》等长篇小说，王安忆开始了“纪实与虚构”的多面探索，这批在80年代叱咤风云的作家在90年代似乎都发生了叙事立场的转移，他们蜕去了精英立场的启蒙话语，而以一种个人化的感受和追问，随意、即性地进入个体经验和记忆内部，想象另一种叙事和生活方式，从关心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状态出发，去重构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文本。而韩东、陈染、张旻、鲁羊、何顿等一批90年代冒出来的青年作家，则以毫无因袭重负的任性，或敞开小说的叙事世界，让当下的生活自动地组织起故事，或钻进幽闭的心灵感受，进行着重围中的个人独语，自得地在文化边缘反复掂量着历史记忆和当下现实的碎片。客观地考察，这些趋向个人化的写作并不形成某种文学思潮，一个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给了作家多种叙事的可能性，尤其当他们难于把握判断这复杂世界的趋向而自身又身临价值惘然时，最佳的创作途径便是退守到自身生存经验的碎片拣点之中，以个人感受的触须去触摸一点时代的初生状态。

但一些评论家则在一种焦躁与雀跃的互动状态下，出于对时代新文学的热情呼唤和对过去文学的匆促结论，开始了对这批文学作品进行“命名”，作出了欲将分化了的文学重新给予“共名”的努力。从1992年到1993年，《钟山》等文学刊物为推出“新状态”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以《优美的告别》为题，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文学语义场已被开辟，认为“新状态”作为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显示出文学告别“他者”时代的到来。他们概括“新状态”小说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 自传与纪实的混合；

2. 象征隐喻的崩塌；

3. 元小说方式；

4. 知识分子叙事人。

所谓“知识分子叙事人”，“新状态”倡导者说：“作家在这个时代实际已经死亡，或者说作家已转化为小说家，而小说家亦可以有闲暇来关心自身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创作状态，他们不必以自己的写作去对应整个民族的生存，一种摆脱政治文化干系的小说家正在诞生，他们可以议论政治、社会，但不需做社会的良知、生活的治疗者和灵魂的工程师，因此不必微言大义影射万千，不必向社会提供象征性的真理。他们有时间也有理由为自己写作了，这便是知识分子叙述人的诞生。”倡导者认为在这种“新状态”下的创作，既摆脱了象征——深度模式，也摆脱了语言游戏——反讽模式，从而使文学真正回到个人的精神活动中。这些关于理论的描述显然带着主观意志的夸张，90年代初中国文学发生了明显变化，却并非是一种急转弯式的反拨。但如果我们联系到80年代是以一场政治风波结束而90年代是以迅猛的商品经济大潮为开端，则不难理解“新状态”主张者急躁地“告别”乃至对过去采取虚无否定的心态。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主张，这样的对民族生存、社会使命和政治关怀的疏离，表面看是回归文学本体的尝试，实际上是对于新的现实新的状态的一种精神躲避，作家、人文知识分子在结束了80年代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之后，进入90年代后就呈现出缺乏想象性“共识”的基础，角色认同的危机感开始蔓延开去，“新状态”看似丰富多形态的叙事背后，实际上已让文学走进了无序和“无名”状态，“回到个人的精神活动”的理念则掩盖着“位置何在”的困扰。“新状态”一面拉近了小说与生活的隔阂，一面也在削弱着文学思索的意识和历史意识。

尽管“新状态”的倡导者力图用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来统辖90

年代初期的创作，但面对着散发开来的多种当下状态和文化转型中的意识形态震荡，当代作家们的话语冲动已经难以凑在一块，且不能不携上几分的混乱和犹疑。在“新状态”提出之后，各种冠以“新”字的文学层出不穷，《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联合推出“新市民”小说，《当代小说》推出“新都市”，还有人推出“新闻小说”、“新乡土”等等。各种各样“新”文学的出现，表明了不甘寂寞的当代作家的浮躁心态，却也证实了现实生活和文化嬗变对于当代作家多方位的冲击，9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的方位调整，不得不以“亲历性”和“主观体验”来应对中国世纪末的八面来风，“新”字文学的折腾喧哗，犹如这时期行色匆匆的赶路人，夹裹着诸多关于都市和乡村转变的信息，在它们对于时代的感性触摸里，似乎有了普通人对于自身处境的感悟，现实的尘世也直接地显露出来。

而此时的王朔依然是一种与知识分子传统区别开来的姿态，他在以游戏和调侃肢解这时代苦痛中，把自己聪明地纳入流通领域，装扮成商业文化时代的弄潮儿，用玩世不恭的叙事，嘲讽着严肃、崇高的母题。王朔这种源于都市边缘人无奈的情趣，则受到众多年轻读者的呼应，这表明了一个衡定价值幻灭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时，人们是如何热衷于在自我解嘲中摆脱自卑的怅惘虚无。王朔表明了王朔们在世纪交替中与拷问灵魂的精英群落的精神分野，王朔的作品吻合许多喜欢轻松的人们的阅读心态。

先锋文学的转型是90年代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同样涌现在80年代中后期，但与“新写实”展示人生本相正相反，它执迷于营造叙事的迷宫和调动文字游戏的潜能，来表达个体经验上的荒谬感。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先锋小说，有意识地要以当代西方世纪末文学为叙事模本，他们出自于文学反叛的需要和向世界文学靠齐的意图，从罗伯——格里耶的时间

摧残和博尔赫斯的叙事圈套中激发灵感，“疏离”人生与现实，把人理解为一种偶然无奈的悲剧存在，从而让自身被整合到西方当代的末世绝望语境之中，只是这种仿造的体验显得比较虚幻飘浮。

所以，当90年代实实在在的精神困顿扑面而来时，当经济大潮带来社会进展也同时引发种种欲望滋生膨胀之时，这些原本在形而上的精神向度上左冲右突的先锋小说家，反而意识到了自身精神的匮乏和荒谬的虚设，因此他们开始把目光从超凡脱俗似的虚拟和想象性的历史中转向当下的现实，转向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余华从残酷的人性黑洞走到平民社会的苦难承受，格非从历史迷舟的飘荡转向对当下欲望的揭示，北村则由迷津中走出，执著于发出拯救人的灵魂的呼告。先锋的转型，是这个时代轻松有趣的生活与空洞艰难的存在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

以史为鉴，寻找昨天、今天和明天那种相互联系和相互解释的文化秩序，是文化转型中重建秩序时经常要出现的一个现象。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有一个文学家争相写历史、出版社争相出历史、读者争相阅读历史的小思潮，一部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发行了100多万册便是个证明。这种现象与同时期的古典书籍出版热、古代人物传记热和历史题材影视热联系在一起，构成了9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一股涌荡着的历史回顾热流。

90年代历史叙事有着可以相互解释但又相互矛盾的两大类，一类是循史而进的史传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像《曾国藩》、《暮鼓晨钟》等等，它们以追寻历史生命的真实和深度为主旨，在史料提供的基础上，想象地重构着历史文化的情境，体现了一种民族反省历史的意识，将历史的崇拜与现实的思索指向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带着书写民族秘史和畸型性史的意向，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从白、鹿两族的生存繁衍，审视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生活的旅程，把历史的故事

引向深厚的宗法文化的土壤之中，将现实主义的历史叙事带到重新发掘民族文化和民族人格的层面。与《白鹿原》相似的作品还有《最后一个匈奴》和《家族》等等，它们都浸透了一种世纪末对历史反省和重构的浓重意识。

与历史反省相对照的是另一类被称作“新历史”的小说。这类小说带着强烈的个人言说方式，或像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那样，将历史叙述成一场芸芸众生的折腾；或像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把一个时代的生活图景想象成一串文化幻觉的拼凑，以游戏的态度对待历史，用后现代的语言消解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这类小说的历史叙事大多出于80年代末期涌现出来的先锋派和写实派作家之手，这些作家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世纪末情绪的块垒，历史在他们各自个人话语的戏谑下，变成了一张零碎无序的话语拼凑物，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暗合了《红楼梦》那句“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人生经验。

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反省历史的叙事，是富于使命和责任的作家从昨天到今天寻找民族文明秩序的心灵迹象，而消解历史的叙事，是作家陷于困境逼于现实的无奈，在历史背景中的失却关怀的一串零散表现。

这是世纪临界的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还表现在绝望和希望、颓丧和信心同时并存的思想意向上。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废都”的意向与拯救的信念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两种情绪、精神潮流在世纪之交的碰撞和冲突，显示了焦虑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

“废都”的意向因了贾平凹的《废都》而成了中国90年代文学的一个争论话题，文化古都四大文化名人在文化转型中的沉沦，聚拢着世纪末人的生存困扰和文化危机，那种以虚名交换声色犬马，只在女人肉体上才显示一点男性价值的颓废，隐含着人在世